

略論章學誠對我國索引工作的貢獻

錢 亞 新

(一)

清人入關之初，中國的經濟、文化受到了一次浩劫，漢人的民族意識也遭遇了極大摧殘。經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由於當時政局的統一和安定，對中國經濟、文化的發展造成了良好的條件。到了乾嘉之際，國內工商業經濟得到更大的發展，文化、藝術在形式上也更顯得繁榮。但是清廷對漢民族復興的思想和運動，卻變本加厲地加以防范，禁止講學結社，大興文字之獄，與此同時還大力提倡脫離現實意義、脫離政治鬥爭的學院派的瑣瑣考據的學風，並前後編輯了不少大類書、大叢書，以轉移漢人反清鬥爭的目標。如康熙時編纂了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萬卷；乾隆時編集了《四庫全書》，共鈔寫七部，每部共收三千五百九十種書，七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卷，約有七億七千四百九十三萬多字，裝成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七冊。這些大類書、大叢書的編輯，雖然在客觀上起了整理和保存中國古代文獻的積極作用，但從清朝統治階級來說，目的卻在於：一方面借此消滅反清文獻，打擊反清活動；另一方面也借此扭轉學風，轉移人們現實鬥爭的視線。因而考據學派，也就是所謂“漢學”形成了。真正研究現實社會的問題成為不可能，一些學者也只能把精力與思想耗費在古典文獻的整理與考訂上去。這些就是章學誠一生時代的背景。

章氏名學誠，字實齋，浙江會稽（紹興）人。他生於清乾隆三年，卒於嘉慶六年（公元一七三八到一八〇三年）。在這六十多年中，正是“專攻漢學，不談義理”的時代。因此，他雖竭力反對漢學，而對我國古代文化史學、學術史學、文學、方志學、校仇學都具有深湛的研究，豐富的經驗，但並未為當時的人們所重視；相反地，卻受到別人嚴厲的譴責。他在《家書二》中曾說“史學義例，校仇心法，則皆前人從未言及，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。”^①這些話並非有意識的誇大標榜，卻是很中肯的自我評價。

他在那封家書中還說：“愛我如劉端臨，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，劉則答以不知，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，難為他人言也。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，而吾心未嘗有憾，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，不敢以時趨之中，不無偽托，而并其真得者，亦忽之也。”這種守己樂道、重視創作的精神，尊重別人學有所得的態度，首先值得我們向章氏學習的。

《文史通義》和《校仇通義》可說是章氏的代表作品。他死了以後，這兩部重要著作，直到一八三二年才刊行於世，然而影響不大。到了一九二〇年，浙江圖書館刊行他的《章氏遺書》，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兩年後，吳興劉氏嘉業堂根據王宗炎所編、沈曾植所藏的鈔本以及其他撰述，再加上補遺、附錄、校記等刊行了另一部的《章氏遺書》，計五十卷。這個本子不僅集章氏撰述的大成，而且有關章氏著作的重要文獻也採錄較全。因此章氏更為人所注目，但對他的生平、思想和學術卻仍很少有人研究。本文擬就章氏對我國索引工作的貢獻，略述管見，就正同好。

(二)

索引也譯“引得”，我國原稱通檢或韻編。這是選取書中一切可求之義、可治之名、可稽之數，立為條目，注以解釋和出處，依照一定方法排列而成的表。它的主要任務在於揭露書中資料，使人們通過它迅速查得需要的原文，以作參考。

我國的索引工作，並非始於章氏。但是他對這項工作，既有理論，又有實踐。早在一七七三年，章氏在《與族孫守一論史表書》^②中曾說：“僕在和州時，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，難於稽檢，曾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，編韻為書。初意欲取全史人名，通編為韻，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，編注其下，則不

① 《章氏遺書》，一九二二年吳興嘉業堂劉氏刊本，第9卷第69頁。

② 同書，第9卷第64頁。

特为讀史要領，且为一切考訂关人事者作資賴也。后以为功稍繁，先将列傳所著人名，編为一卷，今录本呈覽。足下如治年表之暇，再能将二十二史列傳人名，亦仿此例編之，可与年表互相經緯。”

从这封信里應該強調的，首先是章氏提出編制《二十二史列傳人名韵編》的計劃及其目的、方法和预期的效果。其次是为什么他没有完成計劃而只先編了一卷《明史傳列人名韵編》。再次他曾把这一卷韵編抄了副本寄給他的族孫守一，同时还鼓励守一照他的办法来完成他的計劃編制《二十二史傳列人名韵編》。所可惜的，这卷《明史列傳人名韵編》虽然有正副抄本，但是没有留傳下来。

一七七九年章氏所撰《校仇通义》全部完成。他在《校仇条例第七》之中，論述古今校书官守专业有所不同后指出，为了要收校书的速效，必須先編一种工具。他这样的強調說：“窃以典籍浩繁，聞見有限，在博雅者，且不能悉究无遺，况其下乎？以謂校仇之先，宜尽取四庫之藏，中外之籍，擇其中之人名、地号、官阶、书目，凡一切有名可治、有数可稽者，略仿《佩文韵府》之例，悉編为韵，乃于本韵之下，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，自一見再見以至数千百，皆詳注之。藏之館中，以为群书之总类，至校书之时，遇有疑似之处，即名而求其韵編，因韵而檢其本书，参互錯綜，即可得其至是。”^③这正是現代的群书綜合索引，的确是校仇工作上的一种絕好工具。

章氏为什么要提倡編制这种群书的綜合索引？我們认为，这是他针对当时專門汉学而发的批評。所謂汉学，其主要内容不外是：讲訓詁，則研审文字，辨析毫芒；談考证，則循求典冊，穷极流別；論校仇，則搜集古笈，参差离合。章氏是讲究“史学义例、校仇心法”来与时相抗的，他对这些終日埋头故紙堆中，尋章摘句，品詞审字的人，評之为不知为学的目的地，更不知知識的发展應該从閱讀研究，解決問題，进而至于著述創作，經世致用。其实，从事汉学的，如果事先能具备这样一种群书的綜合索引，把所要考证的人名、地号、官阶、书目，凡一切有名可治、有数可稽的对象包罗无遺，那末“淵博之儒，穷毕生之力而不可究殫者，今即中才校勘，可坐收于几席之間。”这完全是可能的。因此，章氏的尖銳深刻的批評确是切中时弊的。

一七八七年，由于友人的介紹和启发，章氏到

河南开封見毕沅，并向他建議編纂《史笈考》。毕沅对章氏很器重，后来又同意他的建議，于是一七八八年就在开封开局編纂《史笈考》，由章氏主其事。从此以后，章氏就随着毕沅的官署所在地进行这项工作。一七九〇年，毕沅在武昌編修《續資治通鑑》，章氏也曾参加襄助。

到了一七九二年，章氏仍在武昌續編《史笈考》。就在这年，他撰成了《历代紀年經緯考》^④和《历代紀元韵覽》^⑤。后者就是前者的索引，其《編輯凡例》^⑥共計六条如下：

一、是編前列表文分为六格，韵中亦照此排次。

一、历代帝王之名字及即位年月、干支、崩年若干岁，在位若干年，改元若干次，俱載于某帝第一改元之下。如一东之大同梁武帝，只书其大同几年，其他有注，見三十陷天監下云云，余仿此。

一、年号同者甚多，如一东之大同，有梁武帝及辽太宗，俱系正統，但于梁武帝上书正統二字，其辽太宗空一格直下，不另冠正統字样，以免重复。他如列国窃据等号，亦照此例。

一、依韵者，以便稽查耳。不能以历代之前后編次，緣年号字样，散見于各韵，不得不錯綜倒置。

一、每韵用字多寡不一，如一东用七字，共二十八号。同字完后，再列中字、通字、隘字，以是朝代之前后及正統列国等，亦只于一字中分前后，并非以迷通之窃据，轉列于永隆正統之前，閱者当会意焉。

一、是編所列錢文一門，与錢法考、錢譜、泉志不同，所載者不过有錢文字样，或即用改元之字及另取字样者，其他如布刀輕重，概不具載，或以遺漏致謬，予亦自知难免耳！

章氏在凡例中，首先明确指出編制这《韵覽》的主要目的，在于便檢，因此作为标目的年号的排列，就不得不与原来的时次，有所錯綜倒置。章氏強調这一点，正足以說明他真正掌握了索引的規律及其应有的任务。从凡例看来，这索引的内容分为两部分：第一部分是表文，指出《韵覽》著录的范围，包括正統、列国、窃据、篡逆、外国、錢文六格。由于章氏受了封建史学傳統的影响，所謂正統、窃据、篡逆三格的区分是應該批判的。其中除第六格錢文外，其他五格是記載各个朝代或开国帝王的簡史。

③ 《章氏遺书》，第10卷第15頁。

④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19卷。

⑤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20卷。

⑥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19卷第2頁。

第二部分是《韵覽》本身，其条目有正有副。指出某帝王第一改元的条目是正确的，指出这帝王其他改元的条目是副的。例如：

[正統] 梁高祖武帝肖衍字叔达南兰陵人齐中
天監興二年壬午四月即位国号梁都建康为侯景所

弑年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十八年

这就是梁武帝第一改元“天監”的条目⑦，也就是正条目。又如：

[正統] 梁武帝注見三十陷天監下十二年 辽
大同太宗注見后会同下一年

这就是梁武帝其他改元的条目，也就是副条目⑧。各条著录事項，都是依据凡例第二条而决定的。章氏这样做法，不仅充实了条目的内容，加强了它的作用，而且有独创的精神，这决不能与今日的陈规等量齐观。至于各条目的排列，完全以凡例第三、四、五条为据。如“天監”以“監”字为对象，排在去声三十陷；“大同”以“同”字为对象，排在上平一东。条目排列以首字时，称为齐头式；以末字时，称为齐脚式。《韵覽》采用后一方式，便于当时的使用，却不合乎现代的要求，可不言而喻。

这《韵覽》作为《历代紀年經緯考》的索引，无庸贅言，但是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呢？我们认为通过它可以查出下面这些材料：（1）有关列入第一部分“表文”中的中外年号及其时限；（2）与年号有关的帝王的庙号、名字、及其即位年月、干支、崩年、在位年数、改元次数等；（3）有关列入《历代紀年經緯考》中的各个改元的名称、干支及其时限等；（4）有关錢文的資料。现在拿《桃花源記》中第一句“晋太元中”为例，試問这晋是西晋还是东晋？这“太元”是属于哪个帝王的年号？共有多少年？干支的起迄怎样？这个帝王的名字又叫什么？

“太元”的“元”字，属于上平十三元，在十三元这个韵目内，先从西汉武帝的“建元”经过“后元”、“始元”等等年号，可以查得：⑨

[正統] 吳大帝注見七廢黃武下二年 东晋烈
宗孝武帝注見七阳宁康下二十一年 **[列國]**
太元前凉張駿字公庭实之子明帝太宁三年立自
凉王在位二十一年

据此，“太元”这个年号曾有三个帝王用过。现在所要查的，当然不是吳大帝，也不是前凉張駿，而是东晋烈宗孝武帝。但只靠这条著录还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好在其中指出“注見七阳宁康下”这句话，

因此，在七阳这个韵目内，又可查得：⑩

[正統] 东晋烈宗孝武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太子
宁康壬申七月即位为張貴人所弑年三十五在位二
十四年改元二三年

通过这样的检查，不仅解决了上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，同时还提供了其他資料。然而要进一步确定“太元”的干支起迄，还应该查对一下《历代紀年經緯考》。在这考里，可以依朝代的先后查得东晋孝武帝第一改元的“宁康”始于癸酉，迄于乙亥，計三年。从丙子到丙申，则为“太元”，計二十一年。这样，有关“晋太元中”这句所发出的几个问题，就可完全回答出来了。实际上，如果以《历代紀年經緯考》中各个年号为对象时，也可由《韵覽》查出有关的資料的。因此，章氏在《历代紀年經緯考序》中所谓“表以經之，韵以緯之，反反复求而举无遗漏，予以考驗史文，旁推傳記，极于金石題識，竹素遺編，可以參质異同，決定疑似，亦习編摩者不可缺，”⑪誠非虛語。

一七九二年，毕沅《續資治通鑑》修成，章氏代毕沅写信給錢大昕，請提意見。信中論及拟为《續資治通鑑》撰述《別录》一篇，并欲推广而及于《資治通鑑》时，曾自称这个建議“其說甚新”。《別录》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章氏在同年所写的《史篇別录例議》⑫中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指出：

《別录》之名，仿于刘向，乃是取《七略》之书部，撮其篇目，条其得失，录而奏上之书，以其别于本书，故曰《別录》。今用其名以治紀傳、編年之史，亦曰《別录》，非刘氏之旨也。盖諸家之史，自有篇卷目录冠于其首，以标其次第。今为提綱絜領，次于本书目录之后，别为一录，使与本书目录相为經緯，斯謂之《別录》云尔。盖与刘氏之书，名同而異用者也。”

但是怎样提綱絜領，使《別录》与本书目录相为經緯呢？也就是說，这种《別录》应如何編制呢？对于紀傳之史的《別录》，章氏认为应该这样編制：

“于紀傳之史，必当标举事目，大书为 綱，而于

⑦ 《章氏遺書》，《外編》第20卷第69頁。

⑧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20卷第8頁。

⑨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20卷第17頁，原文中“孝”誤为“太”，“二十一年”誤为“二十二年”。

⑩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20卷第27頁。

⑪ 同书，《外編》第19卷第2頁。

⑫ 同书，第7卷第48頁。

紀、表、志、傳與事通者，各于其類附注篇目于下，定著《別錄》一編，冠于全書之首，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，張網之得綱，治紀傳之要義，未有加于此也。”^⑬

對於編年之史的《別錄》，却應該這樣編制：

“今為編年而作《別錄》，則如每帝紀年之首，著其後妃、皇子、公主、宗室、勳戚、將相、節鎮、卿尹、台諫、侍從、郡縣守令之屬，區別其名，注其見于某年為始，某年為終，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。

其大制作、大典禮、大刑獄、大經營、亦可因事定名，區分品目，注其終始年月，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。

至於兩國聘盟，兩國戰爭，亦可約舉年月，系事表名，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。

如有其事其人不一以帝為終始者，則于其始見也，注其終詳某帝；于其終也，注其始詳某帝可也。其有更歷數朝，仿其意而推之可也。”^⑭

另外，對於紀傳和編年史中與事相關的詔誥、章奏、書牘、文檄、辭賦、雜文等等，則應該：

“摘取篇名，別為凡目，自成一類，殿于諸類之後，以見本末兼該之旨。”

根據上文所引，首先當明確這種《別錄》不是別的，實際上就是記傳或編年史書的分類索引。其次當理解這種《別錄》的著錄範圍和方法：記傳以標事為主，凡與某事有關聯而散見于紀、表、志、傳中的材料，都注其篇目，集中在事條之下；編年以標人為主，兼及大事，凡與某人某事有關聯而散見于分年之中的材料，都注其起迄年月，集中于各條之下。再次，當注意章氏強調在編年中“必于每帝為篇而不總括全代”，這是吸收《春秋》分紀十二，傳亦從而區分，取其近而易覽之長的緣故。^⑮這種《別錄》編制的方法，其獨別之處，就是能把苦于篇分的記傳，以事為主，用互著之法聯而合之；把苦于年合的編年，收人為主，用區別之法分而著之。這樣，既能分合相濟，又能詳略互糾；既便于檢查，又利于治學。章氏所謂“載筆之士，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于馬班之家學”，^⑯當是指此。綜合章氏這些論述，我們深切地認識到《別錄》不是某些人所說的“史料重組，人事匯編”，而正是記傳和編年二者的分類索引。這不僅僅為便利檢查書中的資料而設想，同時也指出钻研這些史籍的門徑。這就更可以說明章氏倡議編制《別錄》，實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義。“其說甚新”的自我評價，非常切當。可惜，當

時的人們對此未曾重視而使之實現，時至今日難道我們還能輕易放過而不加以推廣嗎？

(三)

根據以上這些史實，我們認為章氏對我國索引工作，主要有下面幾點貢獻：

(1) 促進索引工作向前發展。我國圖書索引工作，並非始於章氏。即以列傳人名索引而論，早在明朝崇禎十五年（一六四二年），就有傅山所撰的《兩漢書姓名韻》問世。但創議編制諸史列傳人名的綜合索引，卻以章氏為首，編制群書中名目的綜合索引，也當推章氏為濫觴。雖說他的族孫守一未能繼承他的索引工作加以發揚，然而章氏友人汪輝祖所編的《史姓韻編》、《三史同姓名錄》、《九史同姓名略》等，却是受其直接影響而產生的。及嘉慶初年，阮元曾集合許多學者編成了一部《經籍纂詁》，可使用者“展一韻而眾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。”^⑰其後又有陶治元等輯的《皇清經解敬修堂編目》，不著撰人的《皇清經解續編目錄》等五、六種同類的索引，但都限于《皇清經解》正續二編及其版本，因此用處不夠廣大。但間接地受章氏的影響，那是顯然的，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後，我國索引工作一時又有所發展。為了當時的需要，有關索引的專著開始發表了；為了要使我國古籍便于檢查、使用和研究，許多專書索引問世了；為了滿足對新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的迫切要求，綜合的或專科的論文索引大量地編制出來了。其中如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》的編制，不僅為《二十五史》一書具備了檢查、使用的工具，而且擴充了《史姓韻編》的範圍和補正了它的缺點。這樣，就把我國索引工作更向前推進了一步。回顧以上這段簡史，可以證明章氏對於我國索引工作的向前發展，曾直接間接起過促進的作用。

(2) 建立索引工作的理論基礎。章氏認為編制列傳人名索引，首先可以便于稽檢，如其能把全書中有关某人重複互見的出處，偏注其下，那末既可

^⑬ 《章氏遺書》，第7卷第43頁。

^⑭ 同書，第7卷第47頁。

^⑮ 同書，第7卷第48頁。

^⑯ 同書，第7卷第47頁。

^⑰ 王引之：《經籍纂詁序》。一八六八年淮南書局補刊本。

为讀史的要領，又可为一切考訂有关人事者作参考。但是章氏对于索引功能的看法，还不止此。他又认为如其能为紀傳和編年史书編制了一个提綱挈領的《別录》放在本书目录之后，这不仅可使它們分合相济、詳略互糾，而且对于讀者既便檢省，又利治史。而更重要的，章氏还认为編制索引，不只是一种編輯工作，而且是一种撰述工作。他为汪輝祖的《三史同姓名录》、《史姓韵編》等撰序宣揚以后，^⑯并在給汪氏的另一信中，特別強調撰序的目的，主要在于“俾閱是两书者，大开眼孔，知有經史专门之学，各自理会大本領，成古今来大著作，毋以比类征事，文人游戏手眼褻玩此书，方为不負吾兄十数年功力。”^⑰他是多末重視索引工作，这非有真知灼見，是不可能讲出这样深切透辟的話来的。應該指出，章氏对索引工作所发表的理論，还是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，既能为讀者便檢設想，又能为补充图书的不足打算，更能为提高索引工作的学术地位立說，这不仅在当时，发人深思，即在今天，仍有现实意义。如其与西方学者称索引为“迷宫的引路”之說相比，更要先进得多，优越得多。因此，章氏在索引理論工作上，实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(3) 創立索引工作的科学方法。編制任何索引，首先要有的放矢，确定范围。在这方面，章氏的思想非常明确。如《明史列傳人名韵編》和《历代紀元韵覽》，它們的范围，一以人名，一以年号。他如群书索引之以名数，紀傳、編年之各以事以人为主，都是一清二楚，毫不含糊。

构成一条索引，必须具备标目、注釋、出处三个部分。虽然章氏創議的群书索引和《別录》，沒有

实现，而且所編的《明史列傳人名韵編》也不傳于世，但是看到他論述編制这些索引的凡例，完全合于上面的要求。即以《历代紀元韵覽》而論，也非常合于法度。如上文所举的“宁康”一条，“宁康”就是标目；“东晋……三年”就是注釋；其中好象沒有出处，实际上“壬申七月”就是指这条索引的所在地位。再“宁康”、“太元”都是东晋孝武帝的年号，但它們的注釋，却有不同，一个詳細，一个簡略，这样，就把它們的主次分清楚了，重复的注解省掉了，互相的联系表明了。这些做法，绳之以現代索引著录的方法，可說毫无逊色。

为了要达到檢查迅速，必須要求索引条目的排列采用一定而为大众所熟悉的方法。以《历代紀元韵覽》为例，这是先以韵排，再以时次；标目全同时，則以格分；在必要时，还用參見法，以便由此及彼，找寻材料。《韵覽》排列的方法是条理分明，井然有序。至于采用分类排列的《別录》，因为未成事实，茲不臆論。

根据上面所提索引的范围、著录的凡例、以及条目的排列三者而論，章氏在索引工作上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，虽不能說已登峰造极，但合于科学规范，毋庸置疑。

总之，章氏对我国索引工作所遗留下来的，虽只有《历代紀元韵編》一种碩果，但因为敢于倡議，敢于提出新穎的理論，敢于建立科学的方法，所以在我国索引学术史上，應該肯定他立言立法的貢獻，應該給予其应有的地位。

^⑯ 《章氏遺書》，第8卷第1—4頁。

^⑰ 同书，第4卷第26頁。

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編輯組 編印“图书馆学、目录学 資料卡片”

为了向图书馆界介紹国内外图书馆的工作状况和图书馆学、目录学方面的学术动态与研究成果，便于积累研究資料，活跃学术空气，交流工作经验，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工作的质量，图书提要卡片联合編輯組决定編印

“图书馆学、目录学資料卡片”。内容包括国内报刊上有关的文章和資料，以及外国的資料。資料的选擇与編写，系由有关单位专业人員协作进行。先編印本年度出版的資料，1962年以前的資料，拟陸續補編，逐步充实。

又訊：为了滿足图书資料单位补购建国以来全国出版中文图书的提要卡片，以便各館、室补充現有卡片目录中的缺漏卡片或者更換用坏的旧片，提高卡片目录质量，图书提要卡

片联合編輯組还决定补編1958年以前出版的中文图书的提要卡片。現在先編印1956—1958年期间出版的中文图书的提要卡片，以后将陸續补編其它各年，逐步經完。

編印1956—1958年的图书提要卡片，基本上是照著北京图书馆讀者目录中的“中文书名目录”的顺序，依次进行的。卡片格式与新书卡片相同，内容系根据原书重新編写。